

现代性逻辑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形成

——马克思早期三个未完成的批判计划解读

苏 哲 金正连

内容提要 作为思想史上的革命,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与现代性思想在逻辑上的瓦解过程是一致的。就此来说,马克思早期思想变迁具有双重的思想史意义,既是理解唯物史观之生成过程和性质的依据,又是透视现代性思想之瓦解过程的中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国民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早期三个未完成的批判计划,记录了历史探索从理性经由劳动再到物质生产之前提的转换,市民社会和工业则是这二次转换的中介概念。在宏观思想史层次上,这一变迁说明了历史科学从外在形式向内在结构、从不变的规律向变迁过程、从末世关照到当下物质生活关切的转换。对于马克思思想史来讲,它记录“物质生活的生产”这一“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是如何形成的,从而亦解释了唯物史观何以必然以之为前提以及它本身的“唯物主义”之含义。

关键词 唯物史观 现代性批判 马克思早期研究 现代性思想史研究

苏 哲,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 213164

金正连,常州大学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讲师 213164

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解释,新历史观探索的起点是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而在1845年3月以后得以形成^[1]。从马克思本人的提示看,结合对他早期思想不断深化的逻辑进程分析,可以合理地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初步形成,经历了法哲学批判和国民经济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评李斯特手稿》等为代表),而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得以表述。这三大批判是一个偶然的进程,还是在逻辑上具有内在联系并由此构成新历史观形成所必然经历的环节?它们在马克思思想史中都最终表现为未完成的计划,这是纯粹偶然的,还是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即对于马克思来说,通过它们得到的“发现”恰恰超出了原初的批判计划而使之成为不可能?本文认为,这三大批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序列,它所呈现的思想进路恰好便是经由人类学意义的劳动而打破理性假设并发现物质生产的逻辑过程,其特殊意义在于记录了作为欧洲近代思想制高点的主体性历史哲学的瓦解过程。从逻辑前提看,便是从理性下降到人类学意义上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一过程。正是在后一前提上,历史得到了全新的定义,它不再是与现实的个人无关的神意或大自然的自我循环过程(自然必然性、合规律性),也不再是与想象的个人(即费尔巴哈意义上的抽象个人)联系在一起的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理性的自我规定过程(自由、合目的性),而始终是有生命的个人不断进行的物质生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简言之,如果说马克思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革命,那么马克思早期思想轨迹有机地说明了这一革命的逻辑。

一、批判:作为马克思达及唯物史观之“远路”的特殊意义

毋庸置疑,没有批判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性质被过度强调(甚至被视为维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合理性的唯一根基)的今天,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特殊意义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估。它不只是对不完美的现实和朦胧主义理论的拒斥态度,而且代表着对自身论述前提的反思性自觉,而这也非简单地等于思想史上那种一种体系或话语替代另一种的“不破不立”战略,例如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而是将启蒙代表的那种理智主义进行到底,把批判本身牢牢地固定社会和历史理论的前提上。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的研究是如此丰富,分歧是那样地巨大,以至于对其进行文献综述成为一种学术上的多余。不过,当我们提出这个任务——即从每一个细节上来把握马克思思想真谛——的时候,反而遗忘了真正的难题,即从思想史逻辑角度贴切地解释马克思早期持续的批判过程,说明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之必然性,从而进一步阐明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个人的个性思想,而且是近代哲学发展的必然,即唯物史观确实代表着欧洲现代思想的革命,也即恩格斯提出的“终结了哲学,开启了历史科学”这个命题。在全部研究中,阿尔都塞曾经正确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批判代表着一种理论上的“远路”或“长征”,马克思并不像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狄慈根解释辩证法时那样采取“近路”——即直接从正面观点入手,而是采取了迂回策略。阿尔都塞从科学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阐明了这一“远路”的意义,“一方面它使马克思必须先批判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然后才能批判其中包含的种种神话;另一方面它训练了马克思,使他学会脱离各种体系本身的价值而独立使用这些体系的抽象结构”。不过,他还是返回到思想史(科学史)上那种意识形态与科学替代的一般逻辑,将其还原为“新对象”之发现过程中“旧形式”与“新形式”的必然冲突^[1]。阿尔都塞的分析,为我们评估马克思早期思想变迁以及记录这些变迁的文本的价值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但他本人并没有完成这一点。特别是其关于马克思思想过程中的“认识论断裂”之截然定义,与传统把马克思思想解释成一个平滑的过程,具有同样的戏剧效应。

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一种新科学,它的诞生依赖于新的发现。新发现究竟在哪儿?在马克思早期出现的重要主题,如自由意志、市民社会、无产阶级都不是新发现。相反,它们恰恰是试图定义正在涌动的欧洲现代性的近代思想的成果,并且这些成果本身因为高于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社会而表现为一种抽象。我们已经看到,由培根、笛卡尔开始的近代思想,自霍布斯开始,以理性作为座架解释历史时,不是把自由精神预设为人类社会的原始起点(自然状态)从而转化为自然理性(即自然正当性,即 natural right),由此把历史描述成合乎规律的过程;就是将其预设为历史的最终目的(最后计划)从而转化为历史理性(即社会契约),由此把历史描述成合乎目的的过程。它的集大成表述便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即主客观相互作用之辩证法作用下的自由历史。这一历史,按照黑格尔本人的说明,表现为“精神”的自我展开。黑格尔是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受益者,亦是其内在性的受害者。由于前者,他正确地把历史的展开与人类自身的理性计划统一起来,由于后者,他坚持认为代表着绝对精神力量的哲学自身便能够通过概念网罗整个世界,并通过整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便达到治理世界的目标,从而抗拒人的本质之“熄灭”和世界“沉沦”的现代性命运。黑格尔没有解释为什么会产生那种现代性命运,他只是通过颠倒基督教的内容,但仍然采取了它的循环论视角,而提供了一种异化论的

[1][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4-75页。

解释(这便是其辩证法的秘密),因此其伟大的“合题”便是基督教的最后狂欢。作为他的激进弟子,青年黑格尔派诸成员,实际上正是在这一逻辑上展开他们轰轰烈烈的宗教批判之政治计划的。包括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赫斯的金钱异化、施蒂纳的唯一者,各种理论实际上都是黑格尔思辨逻辑学之异化论的翻版,在其中显现的都是一种精英救赎的主体思路与历史异化的客体思路的奇怪的结合。黑格尔没有回答的问题,作为现代性思想之末子的经济学以颠倒的方式回答了。说其颠倒,是因为它在自己的前提和出发点上接受了人的本质之“熄灭”和世界“沉沦”的现代性命运(分别对应于“经济人”假设和竞争假设)。尽管经济学抱有自发的恶在竞争中产生自觉的善这个幻想,但它确实以经验事实指认了近代哲学之理性幻象,从而把“自由意志”、“市民社会”、“无产阶级”这些抽象的语汇所指的基基本事实暴露在意识的面前:以私有财产为条件的独立个体、以市场为中介的自由竞争的社会、丧失了劳动资料的工人。马克思最终便是由此出发反过来对哲学进行爆破的,虽然他对哲学本身的怀疑并不首先表现对为对经济学的接受,而是来自自己的那个“苦恼的疑问”,即如何看待“物质利益”和“理性国家”之间对立。

这个“苦恼的疑问”之产生有其偶然的直接起因,《莱茵报》办报实践把马克思卷入物质利益之问题,也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成因。以《博士论文》为代表,他在自己理论思考的起点上信奉理性,这个理性对物质利益保持了冷漠的态度。不过,当把批判的目标转向黑格尔法哲学,即他赖以批判的原则时,批判本身便成为一种新的思考的起点。正是由此出发,马克思开始了一系列的爆破:首先是挖出国家阴影下的市民社会,揭示“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的无产阶级;接着从劳动入手试图击穿古典政治经济学捍卫的私有财产秘密,发现主体性之真正根据,即作“人的心理学”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1];最后,则通过“物质生产”的概念化而确立了历史科学前提的确立,并描述出新的历史观轮廓。

二、法哲学批判:市民社会的浮现与理性的瓦解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作为马克思新历史观探索的起点,具有偶然性,但却是现代性哲学的瓦解的必然起点。

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强调那个事实:现代性哲学的批判或自我批判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从经验上来讲,如果按照一般的意见把启蒙哲学视为现代性的高点或表征,那么保守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它的反动或批判^[2]。在更深层的思想史之中,现代性思想的完成始终伴随着对它的批判,或者说,现代性思想正是在一种张力下完成的,这正是霍布斯VS托马斯·莫尔,洛克、孟德斯鸠VS霍布斯,卢梭VS洛克、孟德斯鸠、霍布斯等等复杂景观的真实意义。在这种对立中,现代性思想以一种曲折而多元的路线确立了,尽管它包含着内在张力,但共享着这样的前提和核心:作为工具的知识、作为理性的人、作为自由的共同体、作为合规律的合目的性的世界历史。在全部现代性争论中,知识的确定性源自感性(休谟)还是理性(笛卡尔),人的理性本质源自自然(霍布斯)还是教化(卢梭),自由是源自消极的天然平等(霍布斯)还是积极的社会义务(卢梭、康德),世界历史是自然的结果(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还是人为的目标(维柯、卢梭),都没有确定的答案。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问题的症结:争论没有超越哲学,批判缺乏对自身与物质环境之间联系的关注。一句话,在思想界发生的只是“震撼世界的词句”之间的厮杀,而与历史无关。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就能够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发现这一点呢?众所周知,黑格尔的体系,作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2]当然,值得强调的是。由柏克、迈斯特等人代表的保守主义,尽管高举传统或基督教的旗帜,但它们在实质上并不属于传统思想,而是在现代性之中已经深刻地浸透了自由精神的别样的现代性道路。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可能从柏克到列奥·施特劳斯、奥克肖特等人之间勾勒出一条连续的线索。

为近代哲学之完成,他通过把矛盾植入历史内部消化了上述诸种对立从而把历史描述为精神自我展开的过程,同时也基于历史之过程的性质消解了理想与现实的对立。但黑格尔有一个致命问题,他历史精神(伦理)化了,并因为否定彼岸而成为对现实合理性的辩护。这个问题在其法哲学和历史哲学中更加尖锐^[1]。简言之,黑格尔的法哲学作为近代理性主义思路的制高点,一方面清晰地呈现出其国家和社会的逻辑,另一方面亦暴露出其内在问题,即在一种绝对理性的历史观中,“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2]。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马克思在《莱茵报》新闻实践期间遭遇到现实与理性国家矛盾时,会把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作为寻求出路的手段。

这个表面上任意的出发点,恰恰把马克思带到了正确的现代性批判之方向上。因为,从整个现代性思想的形成和变迁看,卢梭-康德实现了一个逆转,即从社会的眼光来看待市民社会本身。在他们的批判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双重对立得以彰显:一方面,在理论上,无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洛克)还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孟德斯鸠),政治共同体都被描述为手段,它的基础和目标都在于结成这种共同体的独立个体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另一方面,现实上,随着以货币经济(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为中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国家恰恰表现为社会的异化和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卢梭)。正是因为这一点,不同于现实资产阶级社会的人类社会在卢梭那里作为人类不平等救治的手段出现了。这也正是康德的人类社会概念,即代表人类不断自我改善的那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在康德看来,现实的国家或政府,正是这一历程的起点,而它的终点则是那种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3]。在这一历史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从现实的角度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从理想的角度则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当然,在这种论述中,市民社会本身包含着内在的分裂,即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和理想中的人类社会。不过,这一区分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定义才能够实现。而这一工作无疑是黑格尔实现的。

马克思因为对物质利益发言而转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他极为敏锐地看到了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出发对德国法哲学及其代表的对现代国家批判的意义。这种意义便在于,从国家与市民社会分裂中直接推导出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分裂。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人就是现代国家制度的私人”^[4],而整个现代文明,“它使人的实物本质,即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脱离了人,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5]。如果说,与现代社会相反,前现代的中世纪以等级制的形式使人脱离了普遍性,那么现代人将因为市民的非政治化而丧失了内容的规定性,一方面,作为国家成员,他以公民身份获得了普遍的人的属性;另一方面,作为私人,在市民社会中,将成为没有内容的原子。因为,“在市民社会中的其他一切规定,对于人,对于个人,都表现为非本质的外在的规定,尽管这些规定的确是个人生存于整体中所必需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把个人同整体连接起来的必要的纽带,不过这是可以被个人重新抛弃掉的纽带。”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对于现代社会极为重要的问题,按其表述是,“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6]。这个问题,实际上对应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面对的资本积累问题,即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问题,也即是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性质问题。不过,在这里,马克思尚未意识到该问题的深刻意义,他只是由此形成了在其后对其分析具有重大影响的两个前提性认识:第一是便是现代社会之中人的分裂,这是其异化论,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1844年手稿》)中异化论的逻辑前件;第二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被描述为“并非市民社会

[1]后来,恩格斯在评述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时,运用来自法哲学的例子说明其问题所在。这不是偶然。相反,在逻辑学中,其现实性概念由于对理想与现实对立的那种调和作用而极外具有吸引力,就如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所表明的那样。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实证主义以及其他反黑格尔的思想派系都把辩证法视为一种罪过。

[2]恩格斯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5页。

[3]参阅〔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4][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6页,第346页,第345页。

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的无产阶级。

略过马克思批判的具体进程,可以说,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虽然这表明了其唯物主义立场,但这一唯物主义立场并不具有特殊的意味。因为,他只是把市民社会本身作为与政治国家分离了资产阶级社会,而没有像后来从《评李斯特》手稿开始的识别为蕴含在这种具体的共同体形式之中构成一切共同体基础的经济基础,所以,他只是批判性地坚持了一个立场:资产阶级国家理想是虚伪的,它的现实受制于市民社会。而要真正完成批判,就必须深入市民社会本身,历史地解释市民社会的形成及其与国家的分裂。马克思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把政治经济学作为进一步批判的进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因为,政治经济学,从其形成之初,便是市民社会的自我意识。

三、国民经济学批判:建立劳动经济学的尝试与工业的发现

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1844年手稿》是其重要成果,这个成果可以概括为国民经济学批判。为什么马克思尚未建立自己的经济学便开始对国民经济学(即德国人对政治经济学的称呼)进行批判呢?要理解这一点,不能不说恩格斯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马克思思想逻辑发展之“自然”进程之外的另一因素。恩格斯不仅在马克思之前就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而且从其1844年初发表的《英国状况》系列文章看,他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向上曾经走在马克思的前面。这便是阿尔都塞所称的“近路”。恩格斯的特殊意义是见证了德国式批判的失败。在赴英国之前,恩格斯通过自己的途径站到了德国式共产主义立场,(即主张原则和理念的后来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立场)。1842年11月,恩格斯到达英国后,他一开始便是以德国原则来批判英国利益的,但是在其旅行结束之际却把利益主宰原则的英国作为社会革命的典范加以肯定,他站在工业革命的角度解释了财产战胜国家的必然,揭开了对现代社会人成为物的奴隶这种颠倒进行批判的序幕,同时亦提出了建立劳动的经济学这种构想^[1]。

从逻辑上说,与恩格斯的再次相遇(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马克思主编的《德法年鉴》上发表),在两个方面为马克思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是基于费尔巴哈人道主义通过批判政治经济学揭示当代社会矛盾;二是超出“私经济学”(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称呼,意即政治经济学是为私有制辩护的学说)狭隘视野的道路是从劳动出发。这对于急于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但又以不能直接采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结论的马克思来说,无疑是一个正面的激励。正是这个原因,《1844手稿》是以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社会主义为参照、“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2]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当然,更严格地说,虽然马克思自称揭开了“历史之谜”,但由于马克思并没有能够科学地揭示现代社会的逻辑,而只是通过异化逻辑解释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因此在整体上,这一手稿的基本性质又可称为“国民经济学的哲学批判”(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1850年代以后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直接的亲和性,甚至让我们产生将后者追溯到前者的学术幻想)。这一批判,正是阿尔都塞所称科学发现之“远路”的必要环节。

基于这一背景,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1844年手稿》的逻辑和呈现形式,例如它的三个笔记本之逻辑关联、第一笔记本分三栏写作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的详细解读不是本文的任务。在此,我们强调的是,在马克思试图解开市民社会秘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成长的第二个阶段上,马克思最终曲折地发现了“工业”(实际上是后来的“生产力”)这个更为基础的东西从而为进入新的阶段再次打开了理论视野和空间。

从《1844年手稿》写作的逻辑看,笔记本一开始,马克思便分“工资、资本和地租”——即由古典政

[1]关于这一部分内容的详细分析,参阅胡大平《回到恩格斯》中篇第二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治经济学确立而在其学科史中至今仍然被尊奉(尽管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变化)的关于生产要素(以收入形式表示)的基本教条——三栏,在每一个栏目中,他首先概括自己对该问题的理解,然后阐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该问题上与“工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的对立,最后则是提出手稿本身计划回答的问题(尽管手稿本身的回答并不完整)。他以这种显著(针锋相对地)的方式,撕下国民经济的伪善,指认作为经济学前提的私有财产,其本质是劳动的颠倒,并发展出至今仍然具有重大影响的异化劳动思想,形成他对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第一个理论高峰。

异化是来自黑格尔的是概念,费尔巴哈提出宗教异化问题,使它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的理论工具。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试图政治生活与市民生活的二元性(这是黑格尔首先在理论揭示的)开始追寻宗教异化的根源,通过财产与异化的关系把世俗生活的异化问题置于焦点位置。此时,赫斯也开始讨论金钱的异化或经济异化问题。马克思特别的地方并不在于提出了异化劳动,而是试图从人的世俗生活过程解开异化——从经济到政治再到宗教的异化——之谜。这一思路是从费尔巴哈宗教异化论逐步下降的过程,即从宗教到政治再到经济的探寻。《1844年手稿》的意义便在于通过劳动这个入口打开了道路,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显然挡住了他自己的视野,使得这个开头便是一种绝唱^[1]。甚至,在建构起“异化劳动”理论之后不久,在“笔记本Ⅲ”末尾的两个“片断”和“穆勒笔记”中,这一理论就开始解构^[2]。在这种绝唱处,历史之谜并没有真正彰现。

简言之,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是从主体本质角度来批判私有财产之颠倒性质的。正是在此逻辑中,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代表着主体本质的实现。或者说,马克思是从主体本质恢复来看待共产主义的。这一思路,必然以逻辑替代历史,即把历史视为黑格尔的那样的理念自我展开的过程。不同的是,马克思通过“自我意识=人”这样的公式把理念改造成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使之具有人的外观。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不得不同时诉诸黑格尔的辩证法,将之视为历史之创生原则和变迁机制^[3]。

不过,无论如何,在《1844年手稿》中,借助于国民经济学这个跳板——一个被作为批判对象的跳板,马克思在理解市民社会过程中实现了一个重要的飞跃,即从理性到劳动的飞跃。这个飞跃恐怕是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成果之外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宣布的计划仍然继续着,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最后留下的那个序言强调了这一点。只是批判不再仅仅局限于法哲学,而是扩大为对意识形态(即法、道德、政治以及总批判)的全面批判,国民经济学批判只是该计划的一个部分,一个因为在理论上有所得而作为提前的部分。如果进一步从这一手稿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见解^[4]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之间的联系——对黑格尔逻辑神秘主义的批判——来看,这种批判表现为驾驭“旧的形式”的努力,那么真正的问题恰恰出在不能在旧形式中得到理解的新内容,即劳动的异化,换句话说,劳动的二重性与私有制形成及其克服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在对象化与异化之间做出本质的区分,从而说明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自由劳动)与私有制条件下以“谋生劳动”出现的“强制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而只是将后者视为国民经济出发,自己则从前者出发,以劳动的异化来解释经济学的事实以及私有财产的起源。

严格地说,《1844年手稿》是一个以政治经济学话语和哲学话语对立展开的多种话语冲突的历史叙事。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已经叙述了这两种话语在冲突过程中此长彼消的过程,并发展中

[1]参阅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第四章第一节,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这是姚顺良教授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参阅姚顺良:《从“异化劳动”到“谋生劳动”: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范式解构的开始》,《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7期。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4]马克思在笔记本Ⅲ第XI页提示包括对“现代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略作说明”,但这并没有记录,而是成为其后《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

“人学现象学”等术语来形象地描述了马克思这一阶段的话语特征。对于手稿的全面分析,需要其他专文。在此,我们叙述的焦点是劳动作为历史解释中轴的出现对于唯物主义史观的意义。在总体上,我们认为,借由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把劳动作为历史运动的基石,并明确地提出了人类学劳动与劳动的历史形式之间对立,就这一点而言,他实际地打开了深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历史视角,但是他尚不能解释这种对立,而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支持下采取了与青年黑格尔派一致的异化史观视角从而发展出异化劳动概念。尽管这一概念生动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内在对立而具有深刻性和特殊的理论上的吸引力,但终究不过是一个充满价值意味的临时工具。《1844年手稿》的最重要价值在于提出这个问题,如何从劳动角度来理解现代贫困及其克服?这是通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首要问题!

四、意识形态批判(1):“人”的观点和异化逻辑的瓦解

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强调,“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济的基础,也找到了理论的基础。”^[1]这里,我们直接看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也似乎可以欣喜地认为马克思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是的,马克思已经在道路中,但要达及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有一段艰难的历程要走。因为,在《1844年手稿》中,社会主义还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共产主义还只是“原则”^[2],虽然是在逻辑上具有必然性的原则。

不过,《1844年手稿》借由工业/私有制的对立而敞开了人类感性活动史这个问题,马克思正是由这个问题走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在《1844年手稿》中,在论述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问题的第四个论点中,基于费尔巴哈的感性思路,马克思试图从统一的对象化活动来解释“工业”、宗教、政治、艺术和文学时,以“工业”这个术语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一般关系置于问题的焦点位置,从而为解开“物质利益”之谜、市民社会的逻辑打开了洞见。在1844年底,马克思重新整理了思路,为手稿拟定了一个序言,在其中明确地表示要收拾“神学的批判”,并在与恩格斯第二次会面确立合作后立即着手这个工作。这便是《神圣家族》“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这个批判,是马克思自认为解开“历史之谜”后自觉地清除“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的首次公开论战。它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与布鲁诺·鲍威尔代表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参照,可以称为意识形态批判(1),它表明马克思早期“人”的观念和异化逻辑的瓦解,其特殊意义在于,它亦是马克思与近代理性主义主体哲学的决裂。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在概念上达到后来的清晰程度,但其用“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历史基础的理解时^[3],他们显然明确地意识到了历史的真正动力和展开的舞台。这便是市民社会的新解。我们可以认为,到此为止,马克思初步回答了1843年遇到的那个“物质利益”难题。正是因为这一点,《神圣家族》亦可以视为首部接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开文本。

当然,离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的历史的变革,《神圣家族》还是只站到了门槛边。它的完成还缺少最后的一步。这是因为,尽管马克思已经在逻辑上超出了费尔巴哈,但由于《1844年手稿》的惯性,他仍然试图在费尔巴哈“人道主义”旗帜下谈论“现实的人”的解放。《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简称《提纲》)记录了马克思是如何在逻辑上打破那种惯性,实质地迈出那一脚的。在《提纲》中,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

[1][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第197页,第350页。

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1]

在此,他正确地阐明了费尔巴哈问题,也由此,真正告别了异化史观。代替异化史观的是从“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出发的新型观察历史视角。这个视角在逻辑上,不是来自别人,正是黑格尔。在此隐含的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是,如果不承认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就仍然不能正确地阐明历史的客观机制;但是,如果直接从黑格尔辩证法出发,马克思还不能直接轻松地捍卫自己获得科学前提。因此,在《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把问题赌在感性实践之上,由此作为批评费尔巴哈的前提,然后把问题转向认识论领域。《提纲》由此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框架。然而,历史认识论是逻辑的,而逻辑的东西终究是逻辑的,它不是历史。《形态》(第一章)则是历史的,在这个历史叙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刻意捍卫的唯物主义原则,与他们对客观历史的把握是一致的。

《提纲》并没有直接记录马克思是如何在历史上解开“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机制从而摆脱黑格尔的泛逻辑神秘主义的,但他确实完成了这项工作。这便是同一时期留下的《评李斯特》手稿。在这个手稿中,他开始把当下的工业形式与作为生产力的一般工业区分开来,从而完成了实际上在《1844年手稿》中便出现的那个逻辑难题:把蕴含在作为市民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之中经济基础剥离出来,从这个动力出发来揭示历史变迁的客观机制(即内容)。这个难题的最深层意义并不在于在唯物主义立场上与费尔巴哈区分开来,而是在辩证法上的理解上与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区分开来,后者借助辩证法实际上描述了人类历史的客观进程,但他将辩证法理解为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展开之客观机制,从而在肯定历史形式的确定性时同时否定了作为真实历史内容的偶然差异。从《1844年手稿》开始,马克思实际上一直纠缠于对象化和异化这个同体过程,试图通过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在《提纲》中,他通过对象性活动的能动方面来定义“实践”(praxis),一方面打破了费尔巴哈“实践的人道主义”之唯“物”主义束缚,发现了其唯心主义实质,另一方面则摆脱了黑格尔对其所做的唯心主义解释。由此,他站到了真正的历史前提之上。

五、意识形态批判(2):历史科学前提的确立与“物质生产”的概念化

《形态》记录了马克思1843年开始的意识形态批判之奥德赛式漫游的终点,它表明马克思剥离了笼罩在物质利益之上的理性之光^[2],将之斥为意识形态的迷雾,从而使历史之真正内容大白于天下。这一内容便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关于《形态》之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解读已经很充分了,本文不再展开。在此,我们集中关心两个联系在一起问题:马克思何以将这样一部重要的批判成果最后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作为历史内容从而构成新历史前提的“物质生产”概念究竟具有何种规定性?在我们看来,《形态》虽然是一部完整的著作,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表述来说恰恰仍然是未完成的,它虽然严格地表达了新历史观的认识论逻辑,但却未能真正地基于这种认识论准确在而完整地描述其经验内容。

《形态》未能出版,如马克思本人的解释乃属偶然事件^[3]。不过,我们还是要指出,毕竟手稿还在,马克思在后来仍然有出版它的机会。手稿一直以手稿方式存在的事实,把我们引向它的呈现形式和核心内容之间的裂隙。从内容上看,其第一章草稿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表述而不是其后对施蒂纳(以及“真正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是整个著作的核心和焦点,虽然在形式上恰恰是后一部分内容占据了主要篇幅。特别令人震惊是,在留下的草稿中,后一部分几乎是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逐字逐句的完整批判,而第一章恰恰是未完成的。我们无须纠缠于这是否受到出版审查制度的影响,而必须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4页。

[2]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是其典型形式。黑格尔从一般形式的角度指认近代政治经济学亦是“哲学”。参阅〔德〕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认真审视第一章内容,特别是与后来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对照。在这种对照中,我们必须注意两个重大的差异:第一是《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表述;第二是《形态》与《大纲》导言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物质生产以及历史分期的表述。通过对照,我们可以肯定:《形态》仅仅阐明了新历史观的认识论原则,但未能将这一原则真正贯彻到历史叙述中,即完成方法论在历史叙述中的内化,或者说,完成从研究方法到历史叙述的转化。

关于第一种差异,胡大平已经指出,正如恩格斯自己所做的解释,由于经济史方面的知识的缺乏,《形态》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原则但并没有完整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全面概述^[1]。那么,《形态》的缺失到底在哪儿呢?这便是第二种差异所表明的,它并没有能够从“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之间相互作用的整体出发阐明作为一种主体的社会之复杂构造、其内在矛盾展开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诸种社会历史形态及其变迁,而是正如其提出的四大(所有制)形态说以及对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历程的解释都是以“分工”作为中轴的这一做法表明的那样,在《形态》创作期间,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说明贯穿于人类历史始终并构成人类历史变迁客观基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一般矛盾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总是已经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如以机器大工业代表的生产力)与其在特定生产关系类型之中的现实形式(如资本)之间的具体冲突。实际上,正如斯密所示,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分工概念把现代货币经济规律自然化,恰恰不理解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分工”是一种社会产物而非自然事实。这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已经形成了生产力、交往关系(生产关系)等概念,但还没有科学地定义它们。从马克思思想的实际历程看,这科学定义要到《哲学的贫困》之后才实现。因为这一原因,可以说,《形态》在科学所需要的理论体系上仍然是未完成的。

不过,无论如何,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科学地论证了历史科学的前提,清晰地表达了新的历史观的基本原则,这便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解释社会的客观构成及其运动(历史形态)。这种生产,作为“历史活动”,既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作为对象化活动的劳动,即《巴黎笔记》中所称的作为“自由生命的表现”、“是我的真正的活动的财产”,也不是人类学意义上构成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的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内容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而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之上的物质生活创造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将其具体化为四个基本方面: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生产(即物质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人口的繁衍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正是这一原因,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区分了“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有生命的个体之存在)、“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包括劳动在内的人类生存之客观条件)以及“第一个历史活动”(即创造生活资料的活动)^[2]。由此可见,新历史观既不是从抽象的代表着人的能动性之感性活动的“实践”出发的,亦非从人类学意义上劳动出发的,而是以“物质生产”概念重新定义了历史前提和内容。

六、结 论

综上所述,《形态》代表了马克思早期由物质利益难题推动的寻求历史之迷解答过程的完成,这一过程从内容的角度来说,是通过市民社会解剖不断深入的,从形式的角度来说,是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进行的,即清算笼罩在物质利益和市民社会之上的被设想为历史动因的“实体”、“理性”、“人的本质”等这些幻想、玄想。德国古典哲学代表的思辨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的“实践哲学”都是这些幻想的具体形式,因此马克思的批判也经历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国民经济学批判再到意识形态批判的具体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曾试图以劳动替代理性,以“工业”替代劳动,最终揭示了人类历史

[1]胡大平:《回到恩格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379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531页。

之“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事实。这一过程,不仅在逻辑上清晰地演示了近代哲学“主体”逻辑向现代哲学“存在”(至胡塞尔晚年关于“生活世界”的定义)探寻的必然性,而且与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推动的人类社会基础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型的历史一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作为人类创造自己物质生活的感性活动仍然屈从于自然条件,哲学家们或者杜撰出“实体”、“精神”,或者只能诉诸在历史之外的“实践”来表达创造历史的要求。因此,“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1]。马克思则基于工业的历史揭示了历史的现实基础,并合理地解释了迄今为止各种唯心主义史观产生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不仅描述了新的历史观之基本内涵,而且历史地说明了其合理性。

关于这种历史科学的含义,梅洛-庞蒂曾经从哲学的角度给出一种解释:“马克思的新颖之处因此不是把人类生产力确定为历史的动力,并把哲学看作是对历史运动的反映,而是抛弃了哲学家借以将系统悄悄塞进历史以便随后在那里重新发现它,并且在他似乎要抛弃它的环节来重新肯定其无所不能的狡计。……马克思本人发现了内在于人类生活之中的历史合理性,对于他来说,历史不仅仅是哲学根据合理性来赋予其生存权的事实的或真实的秩序,它是一切意义尤其是概念的或哲学的意义合法地被构成的场所。”^[2]值得再度强调的是,这种“实践的”历史科学之底蕴,虽然马克思是经由上述三个未完成计划实现的,但它们却并不直接记录在三大计划之中。有趣的是,20世纪,马克思早期三大批判的成果,都以碎片的方式形成了单个的奇怪吸引子,围绕它们产生了洋洋大观的论域,构成当代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市民社会、异化和意识形态。现代性批判仍然没有系统地在细节上完成。这一角度说,这无可厚非。然而,如果以此三种之中任何一种路线来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那将意味着什么,这恰恰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责任编辑:曾逸文]

Mar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Logical Critiques of Modernity and the Shap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On Marx's Three Uncompleted Plans of Critique Su Zhe Jin Zhenglian

Abstract: The shap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verlapped the logical collapse of the thought of modernity. In this sense, the early change of Marxist thought is of dual significance to the history of thought; that is, it is both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medium for perceiving the collapse of the thought of modernity. Marx's three early uncompleted plans of critique—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critique of national economics, and critique of ideology, kept a record of the transitions from exploration of reason to that of labor and to that of the premise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t the level of macro history of thought, the changes reveals the transitions from external form to internal structure, from eschatological concern to concern over material life.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ritique of modernity; studies on early Marx; studies of ideological history of modernity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

[2]〔法〕莫里斯·梅洛-庞蒂:《哲学的赞词》,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2页。